毛澤東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

● 沈志華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就其準備和召開的過程來看，可以稱得上是中蘇政治同盟的最佳表現；《莫斯科宣言》的起草和通過，也算得上是中蘇政治合作的經典之作①。不僅如此，在整個會議期間，毛澤東本人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獨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為這次會議的幕後總導演。

蘇共二十大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由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機構領導和指揮的歷史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開共產黨國際會議，而這無疑是毛澤東的一個創舉。正因為如此，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自然成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蘇共二十大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由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機構領導和指揮的歷史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召開共產黨國際會議，這無疑是毛澤東的一個創舉。正因如此，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自然成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

首先在接待規格上，中共代表團就顯得與眾不同。赫魯曉夫 (Nikita S. Khruschev) 對毛澤東的到來特別重視，提前兩天派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 (Pospelov) 和外交部副部長費德林 (Fedorenko) 專程到蘇聯國境第一站伊爾庫茨克去準備接待工作，並且安排了隆重的歡迎儀式。事前毛澤東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規模歡迎儀式，他也不準備在中途停留時走出飛機，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機場發表談話外，沿途不要組織歡迎，因為天氣太冷，他和宋慶齡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車。對此，赫魯曉夫一一照辦，迎接的禮遇規格很高，但儀式很簡樸②。抵達莫斯科後，所有來賓都住在莫斯科市郊別墅，只有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宮內 (在郊外還有兩處備用別墅)。為了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赫魯曉夫還專門為他特製了木板牀，甚至把寢室衞生間的馬桶都改成蹲式③。

毛澤東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立即成為關注的中心。據楊尚昆記載，在十月革命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一出場，全體即起立致敬；毛澤東講話開始和結束時，也是全場起立鼓掌。其餘各兄弟黨代表講話，都是只鼓掌沒有起立。在紅場舉行慶典活動時，遊行隊伍不斷高呼毛澤東的名字，表示致意。遊行結束後，參觀慶典的群眾一哄而上，圍着毛澤東歡呼。「據蘇聯同志說，這種情形是前所未有的」④。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的發言方式也引起了許多當事人的注意。所有來賓都是事先準備好經本黨中央批准的發言稿，在會上照稿子唸，而將俄文譯稿發給與會者。只有毛澤東的三次發言都是即席講話，這使蘇方會務工作人員感到非常為難。在11月18日大會上，所有發言人都是站在講台上作報告，只有毛澤東坐在那裏講⑤。

毛澤東離開莫斯科前，蘇共中央主席團還特意為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葉卡捷琳娜大廳組織了一次與二百多名蘇聯各界著名人士的會見，蘇共領導人幾乎全體出席作陪。會見進行了將近兩小時，毛澤東與出席會見的人們進行了親切愉快的談話⑥。這個場景也是其他所有代表團沒有機會遇到的。

毛澤東對於他本人倡導召開的這次會議非常重視，雖說是「以蘇聯為首」，但中國人的操心出力一點兒也不少⑦。為了辦好這次會議，毛澤東不僅提前趕到莫斯科，而且為中共代表團確定了以團結為中心的方針。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經波蘭和匈牙利的十月危機，再到「馬林科夫反黨集團」事件，社會主義陣營發生的一系列「地震」，不僅引起了各國共產黨內普遍的思想混亂，而且導致陣營內部各國之間，特別是與蘇聯的關係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⑧。這次共產黨國際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至少有一點是中蘇共同追求的目標，那就是加強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團結。所以，中共代表團出發之前，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把這次莫斯科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赴蘇代表團的方針是：對蘇共「以保為主，以批為副」，「以鬥爭求團結，協商一致，求同存異」⑨。為此，毛澤東在莫斯科確實付出了很大努力，主動與各國代表團頻繁接觸，四處游說，突顯了中共的作用和影響。

中共意識到，蘇聯不僅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也是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且長期擔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首領。因此，加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鞏固社會主義陣營，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維護蘇共的威望，堅持「以蘇聯為首」。

一　中共堅持「以蘇聯為首」的提法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公開講話和私下會談中，說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以蘇聯為首」。自1956年初以來，接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和威信受到嚴重打擊。中共意識到，蘇聯不僅是列寧主義的故鄉，也是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且長期擔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首領。因此，加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鞏固社會主義陣營，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維護蘇共的威望，堅持「以蘇聯為首」。當然，在毛澤東眼裏，赫魯曉夫政治經驗不足，蘇共新領導集團在處理國際共運事務中也捅了不少「漏子」；但無論就國家實力還是國際影響來說，只有繼續把蘇共推上領頭羊的地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陣營的穩定和統一。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黨內通知也指出：「社會主義各國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共同的指導思想，因而在原則問題上是有一致的基礎的；即使在某些問題上發生不同意見，也是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同志式的討論和協商，逐步取得一致。」⑩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黨內這樣談「以蘇聯為首」，多少有些居高臨下的姿態，似乎是以一個國際共運指導者的姿態來維護蘇聯的形象。

對於「以蘇聯為首」的提法，波蘭、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黨在討論宣言時曾明確表示反對，其他很多黨的代表內心也不贊成，只是保持沉默而已⑪。所以，

毛澤東除了勸告蘇共接受這個口號外，還要說服其他各國共產黨。在11月1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開幕當天，毛澤東在發言中就專門談了「以蘇聯為首」的問題。毛澤東首先講到需要有一個黨為首的理由，他說：「我們這裏這麼多人，這麼多黨，總要有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內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外部情況說，更需要一個首。」毛澤東接着講到為甚麼要以蘇聯為首，他說：「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黨，它的經驗最完全。」儘管蘇共也犯過一些錯誤，但目前它還是實力最強的，「我們只有一個蘇聯有全副武裝」。至於過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中的不平等現象，毛澤東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承認，現在蘇聯同志的作風有很大的改變，並且還會改變，還會進步。」「現在我感覺到有一種平等氣氛」。毛澤東最後做總結說：「現在承認以蘇聯為首有必要，承認以蘇聯共產黨為會議召集人有必要」⑫。

然而，各方的爭論並沒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發給各國代表後，便收到了不少反饋意見，其中最主要的意見來自波蘭代表團⑬。最後，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宣言起草委員會，討論和修改中蘇兩黨提交的宣言草案。11月15日，起草委員會討論了一天，爭論很激烈。主要的反對意見還是來自波蘭代表團，他們認為不宜提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下午5點半休會時，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些情況。毛澤東決定立即去波蘭代表團住所，同哥穆爾卡 (Wladyslaw Gomulka) 當面交換意見⑭。

在11月1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開幕當天，毛澤東在發言中就專門談了「以蘇聯為首」的問題。他首先講到需要有一個黨為首的理由，接着講到為甚麼要以蘇聯為首。他總結說：「現在承認以蘇聯為首有必要，承認以蘇聯共產黨為會議召集人有必要」。

在會談中，毛澤東與哥穆爾卡先討論了一些枝節問題，並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不過在以蘇聯為首的問題上，會談卻陷入了僵局。哥穆爾卡態度強硬地說，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東西，而目前文件中還有些東西是波蘭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數服從多數，那麼波蘭就不準備參加會議了。毛澤東好言相勸說：大家都作些讓步，這次會議與以往不同，蘇聯有了很大進步，讓蘇共當召集人的意見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並不決定任何問題。波蘭人後來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個內部決議，委託蘇聯召集會議，但不寫在宣言上。毛澤東最後表示：我們應該幫助赫魯曉夫等同志，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兄弟，幫助他們，支持他們⑮。從會議記錄看，毛澤東的勸說起到了一些作用。現場翻譯李越然卻認為，哥穆爾卡接受毛澤東的說法是很勉強的⑯。另一個會談參加者楊尚昆的感覺是，「似有好轉，雙方意見已較為接近，明天可能達成協議。」會談後，毛澤東連夜約見赫魯曉夫和蘇斯洛夫 (Mikhail A. Suslov) 等人，轉告哥穆爾卡的意見，並討論了第二天如何開會的問題⑰。

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員會再次開會，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開全體會議，首先由蘇斯洛夫報告了宣言草案的修改情況，然後是毛澤東帶頭發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內容。毛澤東說：「我認為我們的宣言是好的。我們用了一個很好的方法達到目的，這就是協商的方法。堅持了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原則性、靈活性的統一。這麼一種進行協商的氣氛現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後期不可能。」毛澤東最後斷言：「這個宣言是正確的。它沒有修正主義或者機會主義的因素。」⑱在毛澤東作出具有影響力的表態之後，各國代表團均發言表示擁護宣言，哥穆爾卡也在其中。會議決定基本通過草案，交起草委員會作最

後的修正⑲。在後來發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而沒有再提「會議召集人」的問題。這顯然又是各方妥協的結果。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反覆強調以蘇聯為首，自然是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但是，他對這個問題的說法，特別是11月18日的即席講演，也給人留下了另外一種印象。第一，每個陣營必須要有一個頭，他用了一句中國的俗話，叫做「蛇無頭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的力量最強，所以「這個頭就是蘇聯」，而中國只是政治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還沒有這個資格；第三，蘇聯當這個頭是需要幫助的，中國還有句成語：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笆籬三個樁。「你赫魯曉夫同志這朵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⑳按照這個邏輯，目前以蘇聯為首是因為只有它可以擔負起這個責任，一旦中國的經濟發展了，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為首的就理當是中國了。在1959年10月中蘇兩黨會談發生激烈爭吵時，赫魯曉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許你們指責我們，不許我們批評你們，說甚麼「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對蘇共中央的觀點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㉑。赫魯曉夫後來體會到：「如果所有其他黨都承認一個黨可起帶頭的作用，那麼這個頭其實也可以更換，今天一個頭，明天另一個頭。我們認為，中國人在為自己準備條件，將來要擔任這樣的角色」㉒。

毛澤東11月18日的即席講演，給人留下了如下印象：第一，每個陣營必須要有一個頭；第二，目前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的力量最強；第三，蘇聯當這個頭是需要幫助的。目前以蘇聯為首是因為只有它可以擔負起這個責任。

二　毛澤東努力拉住南斯拉夫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還有一個角色很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南共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不同尋常，且頗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後，赫魯曉夫主動向鐵托 (Josip B. Tito) 道歉，努力恢復蘇南關係，同時要求各國共產黨積極與南共聯繫。1955年3月，中國與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係，兩黨也恢復了聯繫，儘管當時毛澤東本人並不信任鐵托和卡德爾 (Edvard Kardelj)，甚至認為南斯拉夫還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㉓。經過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新被社會主義國家接納。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澤東在接見南共代表團時發表的談話中，對斯大林的大國、大黨主義進行了全面批判，並一再稱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是半個鐵托，表現出對南共的極大同情㉔。但是好景不長，在匈牙利事件中，蘇南之間因處理納吉 (Nagy) 問題引發了矛盾，鐵托的普拉演說更令蘇共不滿，雙邊關係再度緊張㉕。中共也出面批評南共，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將矛頭明確指向鐵托的普拉演說。對此，蘇聯方面表示極為讚賞㉖。不過，當時毛澤東還是把南共的錯誤看作是陣營內部的問題，主張對鐵托既講批評，又講團結㉗。中共認為：「南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兄弟國家。」「我們批評鐵托和卡德爾，目的是要幫助他們糾正錯誤，希望澄清事實和進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們。」㉘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中共很重視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

以卡德爾、蘭科維奇 (A. Rankovic) 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團於1957年11月5日抵達莫斯科，蘇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蘇南兩黨舉行了正式會談，

氣氛自始至終十分緊張。在會談中，赫魯曉夫一開始就宣布，這次在莫斯科將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並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參加，也要發表一項共同宣言。赫魯曉夫嚴厲地指責南共接受美國的援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精神，認為蘇南關係再次緊張的責任在南斯拉夫。卡德爾堅持南斯拉夫的不結盟政策，毫不退讓。他說，南共認為，把世界劃分成集團是人類的不幸，這樣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南共的主張是解散兩極對立的集團，取締作為政治手段的戰爭，實行積極的和平共處，各國人民有權為自己選擇社會發展的道路。至於接受美國的援助，這與當時的冷戰狀況和蘇聯的立場有關，應當對此承擔責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擊南斯拉夫的人。南共代表團還表示，無論如何不能簽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將以一切手段捍衛自己的獨立。會談很不愉快，言詞愈來愈尖銳，赫魯曉夫還講了一些侮辱性的話，但對結果卻無可奈何㉙。

在莫斯科會議舉行期間，由於蘇聯的冷淡態度，許多代表團都有意迴避南共代表團，使他們在莫斯科的處境極為尷尬。同其他代表團的熱鬧活動相比，米丘諾維奇感到，南共代表團「在列寧山可以說度日如年」。

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魯曉夫試圖再次說服南共代表團，建議他們贊成宣言的實質，而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可是這個建議同樣遭到了拒絕。14日大會開始前，南共代表團在使館召開會議，最後確定了他們在莫斯科的行動：只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全體代表會議，並在各黨都同意簽署的《和平宣言》上簽字。這個決定得到了鐵托的支持。對於南斯拉夫的頑固態度，赫魯曉夫顯得有些氣急敗壞，對南共代表團採取了抵制行動。由於蘇聯的冷淡態度，許多代表團都有意迴避南共代表團，使他們在莫斯科的處境極為尷尬。同其他代表團的熱鬧活動相比，米丘諾維奇 (Veljko Mićunović) 感到，南共代表團「在列寧山可以說度日如年」㉚。

毛澤東對南共代表團的態度顯然要寬容和輕鬆得多，他不像赫魯曉夫那樣明知不可為而偏要為之。他既沒有批評南共的立場，也沒有試圖勸說他們同意共同宣言的觀點。毛澤東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歐幾個黨在宣言上簽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團的態度後，11月9日再次與英共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們向赫魯曉夫同志提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黨不參加簽字，會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們的工作，否則資產階級又要攻擊你們，說你們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國和意大利的黨已經決定不簽字。南斯拉夫的黨也不簽字。宣言只由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簽字。我們現在正在說服波蘭，如果波蘭不願意簽字，我們準備由11國簽字。」㉛雖然毛澤東在會議期間一直沒有與南共代表團直接接觸，但在最後階段卻表現出十分熱情的態度。

在11月18日的即席發言中，毛澤東在講到團結的問題時，專門提到了南共代表團，他說：「我又高興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在第二個宣言上準備簽字。他們在六十幾個黨的和平宣言上簽字表示一件甚麼事情呢？就是表示團結。他們沒有在十二國宣言上簽字，使十三國缺少了一國。他們說有困難，我們想也可以，我們不能強加於人，南斯拉夫不願意簽字就不簽字好了。將來若干年後，我想他們是可以在另外一個宣言上簽字的。」㉜這段話似乎打動了南共代表團，大會休息時，卡德爾走到毛澤東跟前說，他對中共同志能夠諒解他們很滿意，他很感激毛主席這番講話㉝。對於孤獨的南共代表團來說，這大概是莫斯科會議期間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縷陽光。而這恰恰給了毛澤東進一步向南共闡述自己看法的機會。

就在會議結束的最後一天，卡德爾提出，南共代表團希望對毛澤東進行禮節性拜會。南共對此並沒有抱很大希望，他們以為毛澤東很可能會因為南共代表團沒有簽署宣言而拒絕接見。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劉曉大使迅速給予了答覆，說毛主席很高興立即接見南共代表團，以致米丘諾維奇感覺毛澤東似乎正在等着他們提出拜會的請求。作為東道主，毛澤東非常親切和熱情地與卡德爾等人會談了近兩個小時。更令南共代表團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對他們沒有簽署共同宣言竟沒有表示絲毫的不滿和責備。當卡德爾說明拒絕在宣言上簽字的理由時，毛只是說，這不是甚麼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個國家乃至蘇共的領導，但由於「俄國人現在喜歡，而對我們也無害」，因此中共不反對這一點。當卡德爾談到南斯拉夫的發展成就，並列舉鋼產量數字時，毛高興地說，如果俄國人的鋼產量趕上美國，中國人趕上英國，南斯拉夫人趕上意大利的話，那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㉞。

南共特別注意到，儘管他們沒有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但在中共眼裏，南斯拉夫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在19日蘇共的告別宴會上，毛澤東特意走到米丘諾維奇身邊祝酒，提議為中南友誼乾杯，又對卡德爾開玩笑地說：「你們和我們的區別只是在於，你們長鬍子，我們不長鬍子。」按卡德爾的理解，毛澤東這是在表示「願意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他頗為深情地對毛澤東說，鐵托同志很希望能夠見到毛主席，希望中南兩黨加強聯繫㉟。在對待南共的態度上，毛澤東無疑比赫魯曉夫更能表現出一個領袖的風範，而他作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儘管這個願望最終未能成為現實。

南共特別注意到，儘管他們沒有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但在中共眼裏，南斯拉夫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待南共的態度上，毛澤東無疑比赫魯曉夫更能表現出一個領袖的風範，他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會主義陣營，儘管這個願望最終未能成為現實。

關於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所起的作用，楊尚昆回國後在一次報告中有如此評價：「在這個會議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決定作用。當然，同蘇聯協商那是沒有問題。但是，許多問題，許多意見是主席提出來的，經過協商以後，他們接受了。」㊱這個說法是符合實際的，不過還必須看到，毛澤東的有些觀點和做法是別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這些恰恰也隱含着未來分歧的基礎。

三　毛澤東語驚四座的即席發言

最令研究者感興趣並引起爭議的，是毛澤東在11月18日大會上的長篇即席發言。他在發言中不時講出一些讓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話語，使得聽眾驚詫不已。

毛澤東一開場就提出了一個後來被眾人傳誦的著名論斷：「東風壓倒西風」。毛說：「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圍繞這個命題，毛澤東講了十件大事，總之，國際形勢已經大為不同了㊲。在11月8日與英共代表談話時，毛澤東也講了這十件大事，並得出結論說：「我總有一個印象：社會主義國家走在前邊，資本主義國家

落在後邊。我覺得，資本主義國家永遠落在後邊了」㊳。11月17日對中國留學生講話時，毛澤東說得更為簡明：「現在，蘇聯有兩個人造衛星上天，六十四個國家的共產黨開會，又是一個大的轉折點，這是世界上兩個陣營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從今以後，西風壓不倒東風，東風一定要壓倒西風。」㊴

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上天，這在當時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說明蘇聯的科技水平，特別是在導彈發射技術方面，已經走在美國的前頭。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的聚會，也顯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古未有的盛況。但是，就此斷定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變化，恐怕是過於樂觀了。對此論斷，赫魯曉夫在私下交談時，已經多次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就目前來看，蘇聯在軍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項目裏是領先的，但美國潛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別是他們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㊵。哥穆爾卡與毛澤東談話時也提出：「自從蘇聯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後，資本主義國家承認他們是落後了，但假如有人以為他們永遠也不會有這種成就那就看錯了。我想他們早晚也會有像火箭這樣的成就的。」哥穆爾卡指出，問題是在目前情況下究竟應該採取甚麼方針政策。他認為「採取的政策不應使緊張局勢更趨尖銳化」㊶。他哪裏知道，毛澤東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本意，就是想強調社會主義不必擔心、也不必反對國際局勢的緊張狀態。

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上天，說明蘇聯在導彈發射技術方面，已經走在美國的前頭。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的聚會，也顯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古未有的盛況。但是，毛澤東就此斷定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變化，恐怕是過於樂觀了。

毛澤東的另一番驚人之語是關於蘇聯黨內鬥爭的。在講到團結的問題時，毛澤東突然插了一段關於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 Molotov) 集團的話㊷：

> 莫洛托夫集團舉行進攻，乘赫魯曉夫同志到外國去，措手不及，來一個突然襲擊。但是我們赫魯曉夫同志也不是一個蠢人，他是個聰明人，立即調動了隊伍，舉行反攻，取得勝利。這個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錯誤的路線，一條是比較正確的路線。斯大林死後這四五年，蘇聯的內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這就證明赫魯曉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線比較正確，而反對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長的鬥爭歷史，但是這一件事他是作錯了。蘇共黨內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帶着對抗的性質，因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個排斥一個。處理得好，可以不出亂子。處理得不好，有出亂子的危險。

毛澤東的本意是對蘇共中央處理六月事件表態，是支持赫魯曉夫的，自然也有勸告蘇共要懂得團結犯過錯誤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澤東在此前曾一再告誡蘇共中央，對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卻在大會上公開指責莫洛托夫，這就很讓人懷疑他的動機。第二，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大會上公開評論蘇共的黨內鬥爭問題，而且用別人不熟悉的語彙「兩條路線鬥爭」把蘇共領導中「兩個不同集團」等同起來——至少通過翻譯後人們是這樣理解的，這就更讓人坐不住了。據米丘諾維奇描述的現場情況是：毛澤東講這段話時，「有幾百人在場的格奧爾基大廳變得死一般的寂靜。米高揚示威性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露出一副決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裏，把目光投向發言者和對稱地坐在蘇聯代表團對面的中國人。……俄國人當中誰也沒有對他說不要這樣

做，也沒有人請他坐下。整個大廳都看着這一場面。」㊸這大概是毛澤東絕對沒有想到的結果。說的是以蘇聯為首，而毛澤東卻在大庭廣眾之下毫無顧忌地隨意評論蘇共黨內的分歧和矛盾，這能不讓蘇聯人惱火？難怪卡德爾在毛澤東講話時傳給南共代表團成員一張字條，上面寫道：「俄國人同中國人在國際工運中爭當意識形態首領的鬥爭開始了。」㊹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有一處也受到人們的質疑，即提出中國將在十五年後超過英國的口號。在11月6日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的講演中，赫魯曉夫在列舉了一系列統計數字後說：「在各種最重要的產品產量方面，蘇維埃國家在今後15年內不僅能趕上，並且能超過目前的美國。自然，在這段時期，美國的經濟也可能有所發展。但是，只要考慮到我國工業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得多這一點，那麼可以肯定，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在和平競賽中趕過美國的這一任務是完全現實的，是完全可以實現的。」㊺聽了赫魯曉夫這番話，毛澤東顯得有些受刺激。當天晚上與哥穆爾卡談話時，毛澤東就試探性地提出：「再過15年蘇聯能超過美國，中國有可能超過英國。」哥穆爾卡當即直言不諱地指出：「蘇聯能超過美國這點無疑問，但中國能否超過英國這點很難說。」毛澤東仍然堅持說：「如15年時間太短，則可延長些，先超過英國，然後再超過美國。」㊻

大概是為了取得可靠的依據，毛澤東在會議期間與法共和英共代表團談話時，又特意談到經濟問題。當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告訴他法國的鋼產量為1,200萬噸時，毛澤東隨口就說：「我們有兩個五年計劃就能超過法國，三個五年計劃超過英國。」在向波立特 (Harry Pollitt) 和高蘭 (John Gollan) 詳細詢問了英國的金融、工業和軍事狀況後，毛澤東肯定地說：「中國在15年後將超過英國。我們今年的鋼產量是52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後將是1,2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後將是2,000-2,500萬噸，第四個五年計劃之後，也就是15年之後，將是4,000-4,500萬噸。英國現在的鋼產量是2,000萬噸。你們看，15年後能增加到多

毛澤東提出中國將在十五年後超過英國的口號，大概沒有多少人把他這些外行話當真。但是，赫魯曉夫趕超美國的時間表後來遭到蘇聯經濟學家和多數主席團成員的質疑和反對，而毛澤東的這句話卻吹響了1958年中國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的第一聲號角。圖為毛澤東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典禮上發表講話。

少？頂多3,500萬噸吧！」法國人和英國人沒有哥穆爾卡那麼直率，對毛澤東的豪言壯語只是點頭稱讚㊼。

於是，在18日大會的發言中，毛澤東鄭重地宣布：中國十五年後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㊽。格奧爾基大廳裏的聽眾大概沒有多少人把毛澤東這些外行話當真——單單一個鋼產量能說明甚麼問題呢？但是，赫魯曉夫趕超美國的時間表後來遭到蘇聯經濟學家和多數主席團成員的質疑和反對㊾，而毛澤東的這句話卻吹響了1958年中國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的第一聲號角。

毛澤東講話中最引起爭議的是關於核戰爭及其後果的一番論述。中共代表團回國後，赫魯曉夫在11月27日出席中國使館招待會的致詞中就表示了對毛澤東發言的不滿，他暗示毛有些講話是多餘的㊿。據赫魯曉夫回憶，毛澤東講這段話時，除了宋慶齡發出會意的笑聲外，「整個會場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靜」，會後許多代表的反應都十分強烈。捷共第一書記諾沃提尼 (Antonín Novotný) 說：中國有6億人口準備損失掉3億，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萬人。哥穆爾卡也毫不掩飾地表示了憤慨(51)。參加會議的以色列共產黨總書記米庫尼斯 (Mikunis) 回憶當時的印象是：毛澤東熱衷的話題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老是翻來覆去地講。他認為大戰不可避免，對此人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我甚至敢斗膽地講，他是根據這場大戰來安排生活和思考問題的，儼然是大戰已經開始了(52)。那麼，毛澤東究竟講了一些甚麼話會給人們留下如此印象？

毛澤東講話中最引起爭議的是關於核戰爭及其後果的一番論述。毛澤東的話驚嚇了東歐一些小國領導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蘇共在論戰中以此為由指責中國好戰和蓄意挑動核戰爭，無疑是有意歪曲。

毛澤東的講話當時並未公開發表，直到後來在中蘇論戰中，蘇聯攻擊中國的核政策時，中國政府才在聲明中引用了這段話，而全文是在1992年發表的。毛澤東是這樣說的(53)：

>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有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蘇共在論戰中拿出了當時蘇方的速記記錄，並由此認為，「實質上，這是一條搞軍事衝突，用軍事手段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的方針。」(54)儘管無法判斷誰更準確地記錄了毛澤東的原話，但對比一下中蘇雙方發表的文件，就發言者所要表達的內容來說，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毛澤東的話。這裏除了翻譯上的問題外(55)，恐怕主要是在場的外國聽眾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澤東那種哲人的思維和詩人的語言。其實毛澤東不過是重複了他說

過多次的話：原子彈是紙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認真對付。至於談到核戰爭的後果，這裏也不過是「極而言之」，從最壞處考慮問題。毛澤東的話驚嚇了東歐一些小國領導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蘇共在論戰中以此為由指責中國好戰和蓄意挑動核戰爭，無疑是有意歪曲。

毛澤東發言的本意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難理解，問題是他採取即席演說這種隨意的方式，來講一個在歐洲人看來是如此嚴肅和敏感的話題，再加上倉促的翻譯，就難免引起誤解和懷疑[56]。不過，毛澤東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語言來闡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紹莫斯科會議的情況時毛澤東說，總的來講，這次會議是成功的，十二黨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較滿意。但是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講，一個是和平共處問題，一個是社會黨問題。毛澤東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然是對的，但是蘇共二十大把和平共處作為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就錯了。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共產黨的對外關係的總路線，就不能只限於和平共處。這裏還有支持世界革命的問題，還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問題[57]。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個如何看待戰爭，特別是核戰爭的問題。

鑒於對核武器的新認識，蘇共二十大提出應通過和平而不是戰爭走向共產主義。但毛澤東一向反對核戰爭將會毀滅人類的看法，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又重複了關於核戰爭的講話，而且說得更加透徹：「要準備對付大戰，帝國主義有瘋子，扔原子彈。頭一次大戰不過死了1,000多萬，第二次大戰死了3,000多萬。打原子戰，沒有經驗。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億人，還有9億人，有9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了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58]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話有一個解釋，他說：蘇共二十大「只講和平不講戰爭，這是很不好的。只講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講戰爭來了怎麼辦。莫斯科宣言解決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講這個」[59]。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也是毛澤東沒有說出來的與赫魯曉夫的重大分歧所在。

莫斯科會議準備和召開的過程表明，中蘇關係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卻面臨着一個由誰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莫斯科會議勝利閉幕半年之後，這些隱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來，並引起了中蘇之間的爭執。圖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

作為結果，總體來說，中蘇雙方都認為莫斯科會議是非常成功的。會議剛結束，蘇共就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黨員和積極份子學習討論，報刊上連續集中報導了一個多月⑳。蘇共中央12月全會決議滿意地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現代國際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則問題的結論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產黨的完全支持，這就證明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一致和團結」㉑。中國國內此時正忙於整風反右，對這次會議無暇組織廣泛的學習討論，但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也認為，「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會議和所通過的兩個宣言，開闢了現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給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進步的力量以極大的鼓舞。」㉒然而，在這個成功的背後，卻暗藏着一種危機。

這種危機並不在於中蘇之間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國之間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況下，求同存異的確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狀況卻非同一般，莫斯科會議準備和召開的過程表明，中蘇關係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卻面臨着一個由誰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中共的成就和影響如東風勁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蘇共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架勢；而蘇聯也恰在此時恢復了元氣，黨內鬥爭結束後國內政治趨於穩定，農業連年豐收預示着經濟發展的美好前景，兩顆人造衛星上天及核潛艇試航成功則標誌着軍事科技開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㉓。在這種情況下，當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受到來自北京的挑戰時，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就無論如何也無法再「求同存異」了。在對外政策方面，對帝國主義究竟是要緩和還是鬥爭？在對內政策方面，到底誰的經濟增長更快，誰的發展道路更能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裏是一定要爭出個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簡單：真理只有一個，誰掌握了真理，誰就有能力和資格取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於是，莫斯科會議勝利閉幕半年之後，這些隱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來，並引起了中蘇之間的爭執。

註釋

① 詳見沈志華：〈中蘇蜜月的最後時刻——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的召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年6月號，頁71-85。

② 參見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未刊，頁2863-68；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3-00107-01，頁6；109-01100-01，頁9；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153。

③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頁158-59；葉子龍口述，溫衛東整理：《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89；閻明復、朱瑞真：〈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一）〉，《中共黨史資料》，2005年第4期，頁19-20。

④⑰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87、288；293。

⑤ В. Сидихмено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Новое время*, no. 2-3, 1993, c. 38-3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16-26。對此，毛澤東的解釋是他害過腦貧血病，站着講話不方便。

⑥ 《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1日。
⑦ 有一個細節也可以看出毛對這次會議的重視：毛澤東為這次訪蘇準備的禮品共396件，其中僅贈送蘇共中央領導人的禮品就差不多裝了整整一個車皮。中國外交部檔案館，203-00107-01，頁4。
⑧ 詳見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載李丹慧主編：《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119-43。
⑨⑪㉝㊼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96-97；131-32；123；150-53。
⑩ 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01，目錄5，卷宗982，第25-29張。
⑫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625-28。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在1956年12月24日的報告中指出，蘇聯正在「積極調整同兄弟國家的關係」，並一再強調，對於蘇聯黨過去工作中「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希望中國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評」。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788-01，頁1-8。
⑬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292；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98-99。
⑭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11-12；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293。
⑮ 1957年11月15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2001年10月（下同）。
⑯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頁166。
⑱⑳㉜㊲㊽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28-30；639-40；639-40；630-38；635。
⑲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293。哥穆爾卡在17日大會的發言中說，承認以蘇聯為首是一個真理，不是人為的，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9。
㉑ 中蘇兩黨會談記錄，1959年10月2日，《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三卷，頁3210-22。
㉒ 〈《赫魯曉夫回憶錄》選譯（二）〉，《中共黨史資料》，總第七十一輯，頁192-93。
㉓ 毛澤東與尤金（P. F. Iudin）談話備忘錄，1955年3月8日，《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十卷，頁2414。
㉔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259-62。
㉕ 參見沈志華、楊村堂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二十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455-68。蘇南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矛盾詳見Л. Я. Гибианский, Н. С. Хрущев, "Й.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2 (1999): 10-29。
㉖ 《內部參考》，1957年1月2日，第2093號，頁3-4。
㉗ 就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發表後不久，劉曉在中國使館舉行晚宴，與米丘諾維奇舉行了親切會晤。米丘諾維奇（Veljko Mićunović）著，達洲等譯：《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北京：三聯書店，1980），頁250-51。
㉘ 周恩來與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月11日，Andrzej Werblan, 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 Dzieje Najnowsze, Rocznik XXIX, 1997.4, c. 119-44。
㉙ 卡德爾（Edvard Kardelj）著，李代軍等譯：《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68-70；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頁443-44。
㉚㊸ 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頁445-55；453-54。
㉛ 1957年11月9日毛澤東與波立特（Harry Pollitt）、高蘭（John Gollan）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
㉞ 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頁456；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頁172-76。

㉟ 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1956-1958》，頁457；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頁172；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冊，頁123-24。

㊱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760；757。

㊳ 1957年11月8日毛澤東與波立特和高蘭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

㊵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頁9-10。

㊶㊻ 1957年11月6日毛澤東與哥穆爾卡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

㊷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4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未加任何說明卻刪去了這段話。

㊹ 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頁175。

㊺ 《人民日報》，1957年11月8日。

㊼ 1957年11月8日毛澤東與多列士談話，1957年11月9日毛澤東與波立特、高蘭談話，筆者採訪，李越然記錄。

㊾ 麥德維傑夫（Roy A. Medvedev）著，蕭慶平等譯：《赫魯曉夫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頁150-51。

㊿ 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214-15。

(51) 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chev）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394-95。

(52) 轉引自麥德維傑夫：《赫魯曉夫傳》，頁157-59。

(53) 《人民日報》，1963年9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635-36。

(54) Правда, 21-22 Сентября 1963г..

(55) 見過該講話的俄文速記記錄的俄國學者庫利克說：「這份文件顯然沒有經過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譯水平也很差」。Б. 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 217。

(56) 毛澤東有一些私下談話更叫赫魯曉夫目瞪口呆。如談到未來的戰爭時，毛澤東告訴赫魯曉夫說，如果帝國主義發動進攻，你們不要還擊，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烏拉爾，那時中國會幫助你們。Н. С.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332-33；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頁395-97。

(58)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號59，第6-8張。

(59)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號126，第16-35張。

(60) 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812-01，頁5-17。

(61) 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編譯：《赫魯曉夫時期蘇共中央全會文件匯編（1953年3月－1964年10月）》（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頁272-73。在實際宣傳中，蘇聯已經不再提「議會道路」，同時強調了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812-01，頁5-17。

(62)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決議（草案），1958年5月23日。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號75，第8-10張。

(63) 中國駐蘇使館報告說，1957年蘇聯的工業生產「獲得更穩步的發展」，農業生產「迅速增長」，人民購買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前八個月的商品流轉額增長，「為過去40年所未曾有過」。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720-11，頁150-58。1956-1958年蘇聯農業生產增長數字見李仁峰主編：《蘇聯農業統計資料匯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頁51-52、137、140。蘇聯第一艘核動力潛艇於1958年12月下水試航的情況見Н.С. Симоно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1996), с. 245。

沈志華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冷戰國際史專家，代表作包括《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蘇聯專家在中國》、《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